

我们曾经年轻

作者：董丰

(上接2023年7月14日第B4版)

“盲流”

我生活在牧民的圈子里，和知识青年难得相遇。知青病了我会去送药。我们有时会在大队和公社的会议上碰面，或者在公社合围打狼的活动中同行。偶尔会有知青马倌路过我们的蒙古包进来喝茶。冬草场上人员住得尤其分散，一个月见不到知青也不奇怪。

1969年冬天的一个傍晚，天已擦黑，一个男知青到红山脚下找我，让我颇感意外。他让我到知青蒙古包去，大家有事商量。看到他严肃阴郁的脸，我感到事态严重，原来知青和盲流发生了冲突。

牧区的汉人除了知青还有一些早先从农区迁移来的。山东人逃荒会闯关东，而内蒙贫困农区的汉人会到相对富裕的牧区谋生。由于不是政府批准的，他们被称为盲流，即盲目流动人口。他们帮牧民打圈造房，赶大车，渐渐被当地牧民接受，得到牧区户口。于是他们衣锦还乡，娶了老婆带过来，把家眷安置在阿尤拉海，或者锡林浩特，自己在大队挣钱养家。把家眷带到大队住蒙古包从事放牧的只有小余子一个。

盲流中有敢闯敢干的多面手，有勤勤恳恳的老实人，也有痞里痞气的社会油子。他们和我们北京知识青年既有语言上的共通，生活习惯上的相似，又有文化上的差异，但一般都是友好相处。

我只和两个盲流发生过不愉快的事。一个是大队信徐向普。他戴眼镜，看着斯文，回乡说自己是教师，骗娶了一个有文化的老婆，把家安置在锡林浩特。他在大队赶大车，常到知青蒙古包做客。

1969年冬天我骑马到台里盟的知青蒙古包，换乘他的大车去公社开会，说好当天坐他的大车返回。下午开会出来，他在我眼皮底下赶车上路，故意不理我的喊话，一路小跑径直走了。

这个玩笑开得也太大了，我可以借住在公社熟人家里，但是第二天还要放牛。看着他坐在大车上得意的笑脸，我气不打一处来。我不想让他以为把我治住了，决定走回大队。从公社到台里盟有四五十里，我穿着厚皮袍和毡疙瘩靴，虽然走路不方便，但是在冬夜里即便睡在雪地上也足以御寒。

草原被积雪覆盖，只有大车道可辨。我顺着车辙向西走，到三大队地界的山口时已是黄昏。两边山坡上巨石垒垒，荒草在风中梭梭作响，让人感到阴森恐怖。加快脚步走出山口，进入巴彦塔拉牧场时天开始黑了。大车道上的冰雪高低不平，我走得踉踉跄跄。风不算大，草原的夜无比寂静。我静下心来边走边欣赏草原的荒蛮和灿烂的星空。

我看到遥远的正前方从天空落下一个白色物体，形状、大小、落速都极像降落伞。我没有听到明显的飞机声，说不清那是什么。我们接近国境线，边疆又在高度警戒的备战之中，不能不让人生疑。我正在心里盘算着如果遇到陌生人应该怎么应对，前面沿

着车道飘过来一个高大朦胧的黑影让我感到紧张。靠近时知道是东北蒙人双宝老汉骑着骆驼出门，才放下心来。

大车道和左边的山梁保持平行，山梁的终端是敖包山，山北坡下面向来是个雪窝子，积雪可达数米深。我第一年冬天出门走错了路，从梁上走到敖包山顶。不想绕远，就牵着马绕着乱石和灌木丛从陡峭山崖上走下来，落到了积雪墙上。好在雪面已经冻硬，没有把我连人带马陷下去。

走到敖包山下时，左边山上吹落的雪把大车道完全覆盖。我需要沿着车道找到知青蒙古包，只好向右边绕了一个大半圆，切回来重新找到车辙的印记。

台里盟在敖包山西边，翻过一个漫坡进入一个小洼地就到了。当我听到身后山上的狼嚎时，蒙古包外的狗也叫了。我走进知青包，看见徐向普还在那里和知青闲聊，看到我的到来他一脸尴尬。我说：“你以为我没办法了？我，回来了。”当夜骑马回到了冬营盘。

林可后来告诉我，她们浩特的狗当夜狂叫着跑了出去，一夜传来远处的狗叫狼嚎。第二天早上受伤的狗回来了，它经过了和野狼的生死搏斗。我是幸运的，步行在荒原没有和狼正面相遇。

另一次的冲突是和汉人朱云。他赶过车，也做过基建，偶尔会到知青包喝茶串门。不知道他是否因为油滑痞子惯了，造访女知青蒙古包时口出秽言。两个知青不好意思，又不敢说什么，把事情告诉了我。我认为如果姑息别人的调戏，以后我们的安全会出问题，就提着马棒去找朱云吵了一架。虽然他耍赖不承认，但是后来没敢再造次。

我在文革中没有整过谁，或者和谁吵过架，一想到面临激烈的对抗我就马上血涌上头，心跳不已。在内蒙，我们不得已要为保护自身的安全而谨慎和抗争。

在牧区除了“阶级斗争”和政治运动的干扰，各族百姓一直和平相处，互通有无。外来的汉人和知青的关系也保持平衡。1969年严冬知青和盲流发生的冲突真让我始料不及。

我连夜回到了知青蒙古包，那里不但有本队的知青，还有吴奇帆从外地调来的四五个援兵。从锡林浩特到阿尤拉海的长途汽车一周只有一两趟，天气恶劣时还会停运。几个援兵居然风尘仆仆从锡林浩特步行百余里走到我们大队。由于没有牧区御寒的常识，皮帽子灌进风，一个男生的耳垂被生生冻掉了。大家都脸色阴沉，蒙古包里弥漫着紧张的气氛。

事情的发生源于一帮男知青要教训盲流，找了小余子开刀。小余子被逼进了一个牛圈，人牛混战，受惊吓不浅。有个知青还在小余子屁股上扎了一刀，大概认为那个部位不会致命，但足以威慑。

看到血流不止的小余子，知青害怕了，把他送到

锡林浩特住院治疗。屁股上的伤似无大碍，但是受惊过度的小余子几日后死于心脏病。他二十多岁，留下了一个年轻的妻子和襁褓中的孩子。

事情过去好几天了，我没有在牧民里听到一点风声，大概因为冬季住得分散，大雪阻断了信息的传播。事情的发生让我感到震惊，我对参与者深深地感到失望，不知道他们怎么会做出这样莽撞的举动，也不明白怎么选择了那个腼腆老实的小余子。大家焦虑的是锡林浩特公安局抓捕了李济宏，他的命运令人堪忧。在文化革命期间，只要一有严打的命令，就难免要多判几个死刑。

几个男生在讨论如何营救李济宏，吴奇帆是会场主角。在一堆熟悉的和生疏的面孔前女生都没有说话。一边是同来牧区的知青队友，一边是留下孤儿寡母的汉人青年。人命关天，如何选择？

李济宏和文志刚来自北京海淀区学校，出身于革命干部和革命军人家庭，但是他们身上没有某些高干子女的狂傲。他们的同学吴奇帆是资本家出身，反而自命不凡，经常出言不逊。天马行空的性格让他不甘屈居于人下，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，他意断情绝地和父母划清了界限，没有被批准到牧区插队，就自己跑来投奔同学，在没有户口的情况下住了下来，成为知青中的一员。他思路敏捷，能说会道，在大队知青里有几个崇拜者。我感到他控制欲太强，话不投机，就没什么交往。

听说吴奇帆等人得知盲流们要在大队夺权，认为要先下手为强，给予威慑和制止，所以攻击了小余子。计划出自吴奇帆，行动时他又不肯去，人死了以后公安抓捕了李济宏。我感觉“盲流要在大队夺权”之说纯属空穴来风，因为盲流从来就没有成为大队生产和生活的主流。文革造成的无政府主义，年轻气盛，妄作非为，终于让知青酿成了大祸。

李济宏的母亲是北京一个院校的领导干部。她到达锡林浩特，表态支持公安按法律办案。救兵们帮不了忙，被劝回原地。我们本队的知青去锡林浩特监狱探监，没有被允许见人。吴奇帆是实际行动的策划者，加之出身不好和无牧区户口，一旦被追责，恐怕刑法判决会十分严厉，他离开内蒙回京避祸。李济宏把责任一人承担了，被判刑。从监狱出来后被转到巴彦塔拉公社监督劳动，直到后来有机会通过知青招工离开内蒙。

不成熟和青春的躁动给巴彦塔拉的知青集体带来了洗刷不掉的耻辱。

(本文收录进“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”系列丛书《永远的青春》。本报经作者授权刊载，版权归属作者。)